

中共党史讲话

(社会主义时期)

中共党史讲话

(社会主义时期)

谭双泉 主编

湖南省中共党史学会

湖南师院学报编辑部

前 言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报告中指出：“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首先是干部和青年中，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加强祖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教育，加强党的纲领、党的历史和党的革命传统的教育，……”这些教育，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有重要意义的。于是，在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同志的关怀下，由省委宣传部和省教育厅组织省会部分高等院校党史教师编写了这本供内部使用的《中共党史讲话》（社会主义时期）。此书是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二大文件的精神编写成的，并注意了吸取党史学界科学研究的新成果、新资料，可供广大干部和青年学习党史的参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特别是中等专业学校党史教学的辅助材料。

赵建德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目 录

- 第一讲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国民经济……(1—42)
- 第二讲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43—81)
- 第三讲 党关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正确方针和政策
……(82—107)
- 第四讲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08—140)
- 第五讲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141—164)
- 第六讲 党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和纠正“左”
倾错误中的曲折……(165—196)
- 第七讲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制定和执
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7—236)
- 第八讲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全国大动乱
……(237—264)
- 第九讲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265—288)
- 第十讲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289—323)
- 第十一讲 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324—342)
- 第十二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的伟大转折
……(343—376)
- 第十三讲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性伟大转变的胜
利实现……(377—400)
- 第十四讲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401—418)

第一讲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恢复国民经济

一、建国初期的形势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

〔建国初期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北京隆重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新中国的建立，宣告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终结，标志着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开始，揭开了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新篇章。

按照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任务，是由工人阶级领导人民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全国范围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承担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由这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新民主主义

义经济的内部，存在着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由于在政治上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上有强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这就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必然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却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形势。在国内，人民解放战争虽已取得基本胜利，而国民党反动派还有上百万残余军队盘踞在华南、西南和台湾等地，负隅顽抗。他们溃逃时留下200万政治土匪，60多万特务分子，60多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各种反革命势力，新解放区约有3亿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尚未进行，封建地主阶级还没有完全打倒，城市和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仍未完成。革命秩序很不稳定。在经济上，由于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穷搜刮，加以长期战争的摧残，使我国工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生产骤然下降，交通阻塞，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整个国民经济是一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破烂摊子。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绝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对新中国的成立，表示极端的仇恨和恐惧，在政治上采取不承认政策，在经济上实行禁运封锁，并利用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进行破坏和捣乱，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

因此，党的任务，就是要把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消灭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建立各地各级人民政府，没收官僚资本，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开展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创造条件。

〔全国大陆的统一〕为了把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实现全国大陆的解放和统一，人民解放军继续向我国的西部、西南

部、南部迅猛进军，追歼残敌。

一九四九年九、十月间，发动湘粤战役，以解放华南地区。当时，我兵分三路，西路军从常德出发，经沅陵，攻克芷江，解放湘西，截断了白崇禧主力西逃退路。中路军十月初向衡阳地区发起进攻，将白崇禧主力四个师，一举歼灭于衡（阳）、宝（庆）、祁（阳）三角地带，衡阳、宝庆（邵阳）等城相继解放。东路军九月下旬，出赣南，进广东，十月中旬，解放广州。月底，湘粤战役结束，共歼敌10多万人，解放城市64座。

十月下旬，第一野战军王震兵团，进驻迪化（现乌鲁木齐）最后完成了解放大西北的任务。

白崇禧部在湘粤战役后，龟缩广西老巢。我军于十一月初发起了广西战役。十一月下旬，解放桂林。十二月初，解放南宁。随后，我军越过十万大山，追歼逃敌，十二月十一日，解放陆南关。至此，广西全境解放。这次战役共歼敌172,000多人，解放城市80座，全歼了白崇禧的部队。

当湘粤战役结束，广西战役尚未开始时，我军于十一月初发起了西南战役。为了加强对大西南革命和建设工作的领导，党中央决定十一月下旬，在湖南常德成立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我军解放西南的战役是分两路进军的。一路由芷江入贵州，十一月中旬，解放贵阳一带，截断了川、陕、甘地区数十万敌人向滇、黔和广西敌人向贵州的退路。另一路由宜昌、常德地区西进，扫残敌，入四川，十一月底解放重庆，接着又用和平方式解放了云南和西康。十二月下旬，对被包围于成都地区的胡宗南部40余万人发起总攻，全歼敌军，解放了成都。国民党“逃亡”政府只得迁往台湾。西南战役共歼敌约90万人。一九五〇年四、五月间，我军渡海作战，解放海

南岛和舟山群岛。

一九五〇年春，中央人民政府命令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并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中央谈判，以便和平解放西藏。一九五〇年十月初，我军分路渡过金沙江、怒江和澜沧江，直指西藏。十月中旬迅速解放昌都，歼灭藏军主力，打开了通向西藏的孔道。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等到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派出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等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举行谈判，五月下旬、双方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协议规定，进驻拉萨，宣告西藏和平解放。至此，除台湾省和若干海岛以外，全部国土都获得解放，实现了中国大陆的真正统一。

〔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 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全国的胜利推进，彻底打碎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机构。但由于战争还在局部地方进行，反革命势力还相当猖獗，党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在新解放的地方，立即建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开展了接管城乡，发动和依靠群众，剿匪反特，建立革命秩序，恢复生产事业，巩固人民政权的工作。这种军管制度，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最初形式。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最根本的政治制度。由于解放初期，社会民主改革在大部分地区还未完成，人民群众尚未充分组织起来，还不具备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一般地区都先后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即由各地军管会和人民政府邀请若干人士为各界代表，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作为军管会和人民政府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随着社会秩序的安定，人

民觉悟的提高和群众组织的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逐渐改由选举产生，代表会议的作用也逐步过渡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地方人民政府，成为人民行使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到一九五一年三月，全国有23个省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94.8%的县，也都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这就调动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密切了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增强了各民族的团结，加强了人民民主政权。全国大陆的统一和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省和某些海岛以外）的国家统一和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为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没收官僚资本〕 在各大、中城市解放以后，各地军管会和人民政府，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共同纲领》的规定，没收原来属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一切工厂、矿山、铁路、轮船、邮电、银行和其他企业，把它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到一九四九年底，共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2,858个。我国政府还区别不同情况，对帝国主义在华企业采取了管制、征用、代管等措施，使这些企业也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一部分。官僚资本的没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建立，使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一九四九年底，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国营工业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41.3%。国营经济拥有全国钢产量的97%，生铁产量的93%，原煤产量的69%，棉纱产量的53%，此外，国家还掌握着全国铁路运输和绝大部分银行业务。这就对迅速克服国家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了十分重要的保证作用。并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统一财经，稳定物价〕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严重的财

政经济困难。一方面，由于我们从国民党反动政权接收过来的国民经济，是一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几乎处于全面破产的境地。这时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同抗日战争前的最高年产量相比，粮食和大豆的产量下降25%，棉花产量下降48%。钢产量降低83%，原煤降低48%，电降低28%。棉布降低32%。连年受灾，一九四九年受灾面积达12,000万亩，灾民4,000万人，城市约有400万失业人员，急需救济。另一方面，人民解放战争继续在推进，军费开支在一九四九年占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一九五〇年占41.1%。同时，我们对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大批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连同原先解放区的军政人员，约有900万人需要国家负担生活费用。这样，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支出很大一部分不能不依靠发行货币来解决。人民币的发行量，以一九四八年底为基数，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增加约100倍，到一九五〇年二月则增加270倍。这种做法，虽然解决了当时战争和重点恢复国家建设等需要，但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物价的波动。这时，投机资本家便乘机捣乱，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七月、十一月和一九五〇年二月，先后掀起了四次大的物价涨风。其中以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那次最为严重。从上海开始，先是五金、化工等进口工业原料商品价格上涨，十月中旬，纱价开始剧烈波动，跳跃上升；十一月份，粮价紧跟猛涨。这期间整个物价每天上涨10%到30%，至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物价比十月上旬上涨了326%。并迅速波及了其他各大城市。这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市场领导权的严重斗争。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曾一致断言：中国的财政经济困难是无法克服的。

在财政经济困难的形势下，陈云受党中央的委托来到上海。一九四九年八月，他主持召开了有华东、华北、华中、东

北、西北五大区的财政、金融、贸易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对稳定市场物价的斗争作了明确而具体的部署。其总的指导思想是：要使物价稳定，必须控制人民币的发行量，尽快恢复生产，活跃经济，增加收入，掌握大量重要物资，并厉行节约。为此，必须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如：国家统一掌握货币发行，统一管理财政收支，统一调度粮食进出，集中掌握重要物资，发展供销以恢复工厂生产和商品流通，抓紧收购农村产品以供应市场必需和增加农民收入，整顿机构、精简人员以节约开支，等等。特别是控制货币发行，掌握物资，对于稳定市场物价具有重大作用。当时，为了控制货币发行，采取加强税收、发行公债、吸收社会游资等办法；为了掌握物资，采取加强征收公粮，集中控制纱布、煤炭、食盐，抓紧收购农村产品等办法。陈云对加强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很重视。他强调指出，要稳定市场，控制物价，主要是国家要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和纱布；掌握粮食以稳住城市，掌握纱布以稳住农村，从而遏制投机资本家的兴风作浪。经过这番较量，到一九五〇年三月，各地物价即呈回落。资产阶级不能不为之折服。这一胜利，成了我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前奏。

制止通货膨胀，控制物价，稳定市场，是同实行国家财政经济的统一管理分不开的。如陈云所说：“如果国家收入不作统一使用，如果国家支出不按统一制度并遵守节省原则，如果现有资金不加集中使用，则后果必然是浪费财力，加剧通货膨胀。”^①早在一九四九年冬，党中央就确定了全国财政经济实行统一管理的方针。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了全国财政会议，研究解决我国财政经济困

① 《陈云文稿选编》（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71页

难的政策和措施。在陈云的主持下，会议详细地讨论了全国财政收支、贸易、粮食、金融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决定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以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现金出纳平衡和金融物价的稳定。三月三日，政务院据此作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分析了当时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特点，说明了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重要性，规定了其基本内容是：统一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由国家集中使用。这三个统一，使全国的财力物力统一集中于中央，对平衡收支，稳定物价，扭转当时财政经济的困难局面起着重大的作用。

同时中央人民政府还统一了全国税制和加强了税收工作，采取了核实编制、清理仓库、控制投放、节约开支等项措施，并发行了胜利折实公债。全国各族人民交粮、纳税，购买公债的实际行动，积极支持了人民政府。

由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决定的贯彻和以上各项措施的实行，到一九五〇年四、五月间，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实现了统一，改善国家财政经济状况，使财政收支很快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初步克服了国家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这是新中国在经济战线上的一个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我国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但并没有根本好转，甚至又出现了新的困难：许多私营工商业突然萧条，商品滞销，工厂停工减产，商店歇业倒闭，劳资关系紧张，工人失业增多。到一九五〇年五月，全国失业工人总数达到110多万。这首先是由于反动派的残酷榨取和长期战争的破坏，广大人民购买力极低，通货和物价一旦得到稳定，原来社会上由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虚假购买力顿时消失，人们不但不再

竞购和囤积，反将长期囤积的物资赶快在市場脱手，这就造成商品滞销；同时因为过去的工商业，主要是为帝、官、封服务并依赖帝国主义者提供原料和动力，现在却失去了服务的对象和广阔的市场，不得不停产、倒闭；还因为私营企业生产的盲目性和经营方法的不合理，现在已不适用了。加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的改组过程中，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刘车”急了，社会经济不能不发生“后仰”现象，这就加重了上述困难的程度。

在这些困难的时刻，民族资产阶级同我党的关系十分紧张。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难以维持生活的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随着社会改革运动的开展，我们同三大敌人残余势力的斗争还很激烈。这时党内有些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情绪，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企图乘人之危一举消灭之，以便早日实现社会主义。

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孤立和打击主要的敌人，克服当时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至九日，在北京举行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36人，候补中央委员27人，并各省、市党委书记及其他工作人员42人。在会上，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会议还听取和讨论了刘少奇、陈云、周恩来、聂荣臻分别就土改、财经、外交与统战、军事等问题作的报告。

毛泽东在书面报告和重要讲话中，着重阐述了如下的主要问题：

一、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明确提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是当时的中心任务。毛泽东认为，目前的

国际情况对于我们是有利的。尽管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而避免战争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毫无根据的骗局。在国内，我们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表现了财政经济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好转。我们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以便获得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条件。

二、提出了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和八项工作。毛泽东说：“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①为了创造这三个条件，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还必须做好下列八项工作：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调整税收，合理调整现有工商业；整编行政机构，复员一部分军队；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教育文化事业的改革，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认真地进行对灾民的救济工作和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全党的整风运动。

三、规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战略策略方针。建国初

期，针对一些同志在胜利的情况下，企图提早消灭资产阶级，有四面出击的思想，毛泽东清醒地指出：在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我们面前还有很复杂的斗争，还有许多困难。当前总的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因此，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个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我们就能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这就是三中全会的路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战略策略方针。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是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全会通过的毛泽东的报告和讲话，是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纲领性文献。它所提出的党的任务、方针、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保证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

二、抗美援朝和各项社会改革运动

〔抗美援朝〕正当中国人民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时候，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在美帝国主义唆使下，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发动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进攻。二十七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命令美国军队直接参战。同时派出第七舰队霸占我国领土台湾省。美

国侵略者妄图侵占中国,以实现其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野心。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满以为年青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堪一击,狂妄叫嚣“三天完成北伐”。但是,朝鲜人民军以猛烈的反击,打破了敌人的战争日程。八月初,即将敌人赶至朝鲜半岛的东南角大邱、釜山一隅。美帝国主义乘人民军翼侧暴露,后方空虚之际,纠集了英、法等十五个仆从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由“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指挥,调集了5万陆军,300艘舰艇,500架飞机,于九月十五日,在朝鲜中部西海岸仁川登陆,截断朝鲜人民军的后方交通,使朝鲜人民遭受严重的损失。侵略者疯狂大举北犯,麦克阿瑟叫嚣:“在感恩节(十一月二十三日)前,南北朝鲜各地的正式抵抗都将告终。”

朝鲜战争开始后,中国人民和政府就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一再提出警告。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和坚决的抵抗。同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侵略朝鲜、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美帝国主义直接出兵在仁川登陆后,周恩来又严重警告美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美帝国主义却无视中国人民的警告,一九五〇年冬初,继续大举进攻,还叫嚷:“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把两国截然分开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把战火烧到鸭绿江和图门江边,并多次派飞机野蛮轰炸我东北地区,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面对着美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被气势汹汹的美帝所吓倒,担心进行反侵略战争会“引火烧

身、，“惹祸上门”；或者由于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侵略阴谋认识不足，错误地认为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会“适可而止”，反对我军出国作战。党内林彪和高岗等人也借口国家刚刚初定，国内残匪没有肃清，我们只能顾内，不能顾外，说什么“宁可断其一臂，不可毁其全身”，主张明哲保身，“关门建设”。国际上有些好心朋友也担心，动乱多年刚刚统一和独立的¹中国，出兵朝鲜同美帝打仗，能否取胜。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高举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光辉旗帜，极力主张出兵援助朝鲜。于是，党中央应朝鲜人民和政府的请求，经过充分讨论，果断地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十月八日，毛泽东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命令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九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隐蔽过江，十九日到达朝鲜前线，和朝鲜人民军一道，抵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初，我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正义行动。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初期，敌人总兵力近70万人，其中美军41万，李承晚军24万，英、法、荷、比等15个仆从国军4万多，并拥有舰艇270艘，飞机1,000多架。我志愿军既无飞机，又无军舰，坦克和大炮也很少，主要的武器是步枪和手榴弹。

志愿军出国后，彭德怀等结合朝鲜战场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党中央制定的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配合的战略方针，与朝鲜人民军密切协同，并肩作战。从一九五〇年十月到一九五一年五月，继续进行五次大规模的战役，把美国侵略军从鸭绿江和图们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以南，